

# 魏晋玄学之祖

跃进

扬雄以大赋扬名于世。仅《汉书》本传就全文记录了他的六篇辞赋，即《反离骚》、《甘泉赋》、《河东赋》、《长杨赋》、《解嘲》、《解难》等，可见他在汉人心目中的地位，首先是一位辞赋家，这一点，大概永远没有人会表示怀疑。从这些辞赋来看，正如《汉书》本传所说，均刻意模仿司马相如，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，所以，后世常常扬马并称。但是五十岁以后，他却又反戈一击，悔其少作，并对于汉赋采取一种几乎全盘否定的态度，认为大赋不过是“童子雕虫篆刻”的小技而已，“壮夫不为”（《法言·吾子》）。对于这种前后尖锐对立的看法，博得了历来的研究者极大的兴趣，也引起了相当大的争论。这些争论，不仅限于对于扬雄的看法，而且涉及到对于汉赋的评价，也是文学史上的一个热门话题。

不过，今天还是暂且先把这个话题搁在一边，来看看扬雄的另一幅面孔。

《汉书》本传记载说：“雄少好学，不为章句之学，训诂通而已，博览无所及见。为人简易佚荡，口吃不能剧谈，默而好深湛之思，清静无为，少嗜欲”。所谓“不为章句之学”，据我的理解，就是对于汉代盛行的那种皓首穷经的学风不以为然，而追求自己的风格。

这种风格鲜明体现在尚不为时人所重的《太玄经》《太玄赋》以及冷嘲热讽的《解嘲》和《逐贫赋》中了。

当时，外戚专权，小臣董贤得宠，忧国忧民者



遭到排挤，群小充斥朝廷，趋炎附势者加官进爵，青云直上。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，扬雄有意避开了当时政治斗争的漩涡，“默然独守吾太玄”，埋头撰写《太玄经》。很多人嘲笑他“以玄尚白”，玄妙的道理并不能改变其政治地位，讽刺他不善于仕进。为此，他写了《解嘲》来为自己辩解。

《解嘲》在思想内容和写法上都深受东方朔《答客难》的影响，两赋都阐述了“世异事变”的道理，但是《解嘲》对于战国和汉代时势之不同的认识更为深刻，论证也显得更为充分有力。他在此文中虽说当时是个太平之世，实际上却指出了当时掌权的大臣都是庸庸碌碌之辈，这些人不可能任用人才。他说：

故世乱则圣哲驰骛而不足，世治则庸夫高枕而有余。夫上世之士，或解缚而相，或释褐而傅，或倚夷门而笑，或横江潭而渔，或七十说而不遇，或立谈而封侯，或枉千乘于陋巷，或拥篲而先驱。是以士颇得信其舌而奋其笔，隙隙蹈瑕而无所诘也。当今县令不请士，郡守不迎师，群卿不揖客，将相不俛眉。言奇者见疑，行殊者得辟。是以欲谈者卷舌而同声，欲行者拟足而投迹。乡使上世之士处乎今，策非甲科，行非孝廉，举非方正，独可抗疏，时道是非，高得待诏，下触闻罢，又安得青紫？

皇帝大臣们见到人们提出政见，不是予以采纳，而是加以压制甚至打击，以至虽有贤才，也无所舒展其抱负。这样的官僚体制怎么能够长久维持下去呢？因为“炎炎者灭，隆隆者绝”“攫拏者亡，默默者存，位极者高危，自守者身全。是故知玄知默，守道之极；爰清爰静，游神之廷；惟寂惟寞，守德之宅”。他看出了那些显赫一时的权贵，终究逃脱不了覆灭的下场。而自己所追求的是“清静”“寂寞”的道家境界，用以与世俗相抗衡。至于《太玄赋》，道家思想更为浓厚，如“观大易之损益兮，览老氏之倚伏”，把《易经》《老子》提到至高无尚

的地位。

《逐贫赋》假托自己对“贫”责难，而“贫”则与之争辩，最后他被“贫”说服，认为贫困是好事，决心“长与汝居，终无厌极，贫逐不去，与我游息”。赋中写道“扬子遁世，离俗独处”，正写出了扬雄游离于儒家束缚之外，沉浸于道家淡泊之中的感慨。此赋嬉笑怒骂，皆成文章，颇有魏晋风度。魏晋时期嵇康有《太师箴》在批判统治者专制暴虐方面，有些手法与此类似。晋代左思《白发赋》、张敏《头责子羽》所用的艺术手法，也都与此赋有某些渊源关系。至于唐代韩愈的《送穷文》，更是通篇都是模仿此赋，而柳宗元《乞巧文》也可以说受到此赋的启发。

这些作品，与扬雄“弘丽温雅”的大赋形成鲜明的对比，不以典丽宏富的藻饰取胜，而是对现实采取一种基本批判的态度，遗世独立，努力追求一种玄远淡泊的老庄思想，平易流畅，较少雕饰。很明显，这在汉代儒学鼎胜之际，确实别一种风味，别具一幅面孔。

从某种意义上说，扬雄的这种独特的风格，实际上已经开启了魏晋玄学的先河。魏晋玄学以《老子》《庄子》《周易》为“三玄”，为士人津津乐道。而这三部书也深为扬雄所稔熟，并且深深地影响到了他的思想和创作。魏晋以后有不少玄学家推崇扬雄，可能与此有关。而陆侃如先生《中古文学系年》即以扬雄出生作为中古文学的开端，也许正是从这一点来着眼的。

（作者：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副研究员，文学博士）